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文化部、徐景贤控制上影

为他们篡党夺权造舆论的罪行（之一）

（大会发言稿） ——江雨声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反党阴谋集团，是一伙假革命的反革命，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到处煽手，煽风点火，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他们在宣传报导中，在戏剧、电影文艺创作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咒骂、陷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他们对电影，特别对上海电影这块阵地，通过马、徐、王旧市委和文化部更是实行高压，严加控制，他们累累罪行，我们要一笔笔清算。

中央领导批评上海市委批邓另搞一套，这是四人帮张春桥和上海市委阴谋策划的，在今年5月27日，马、徐、王他们从北京开会回来，28日，徐景贤就在展览馆召集了理论、新闻出版、文艺、高等院校、文化、电影和工农兵的理论骨干几百人的所谓座谈会，徐景贤说：“我们昨天回来，根据张春桥的提议，市委常委决定，先找部分理论骨干……进行传达，以便及早进行斗争。”由于他们搞

阴谋，造舆论，对于毛主席批邓的指示，不先在党内传达，连区县局、市委各组办的领导同志都还不知道，他们作贼心虚，宣布了不得外传，不得传抄，不得遗失，不得泄露的“四不”纪律。这个所谓的座谈会开了四、五天，他们根本不组织讨论毛主席2条指示，不谈斗争的意义，不讲毛主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竭力迴避毛主席指出的现在是着重是有所不足方面，拼命引导讨论民主派怎么变成走资派的，徐景贤和市委的常委们在大组交流会上一再强调“文艺工作追名逐利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破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他们为什么召开这样的会议，违反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统一领导，这么重视理论骨干呢？在这个会上定下调子，所以后来批邓就点了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名，发了大批黑材料，把所有付总理的名都点了，唯独把四人帮王洪文的名字划掉。早在这之前张春桥就有黑指示：“今年一月七日绳树山在文学组讲‘春桥给〈朝霞〉有个批示，‘关心队伍比关心作品为重’。”这些老反革命是妄图把上海的理论队伍和文艺工作者都搞成四人帮的政治打手，搞成篡党夺权的先锋……。

当广大群众提出质问，我们反映上去时，韩英杰在2月16日党员干部学习班上说，清华是毛主席抓的点，我们是跟清华的，一点也没走在前面，又说，有人材料不看了。领导讲：你们说好了，是清华来的，是市委发的，他们对我们封锁不给，我们拿来批不行

吗？韩英杰说的这个领导是谁？这个“他们封锁”又是指谁？是有人封锁，还是四人帮和上海市委造谣、陷害？有人揭了张春桥这个狗洞爬出来的叛徒是炮打，点了那么多中央领导同志，不是炮打，不是攻击党的领导吗？

在批邓中，群众对材料中有攻击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的内容提出疑问，说中央发了文件的也是错的吗，这情况我们也提出质问，今年1月12日贺汝仪、绳树山急急忙忙跑到电影局在学习汇报会上说：“中央文件并不是不会出错，毛主席圈阅过的不一定都对。”还说：“桃园经验、二月提纲、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的矛盾写进八大文件，这不是正式文件呢？”在会上还批评我们批邓步子太慢，要求我们要快，那天正好厂里开党员大会，尽管我觉得这说法自己也想不通，但怕步子再慢贯彻不力，还是传达了，这次我是快了，跟的紧了，可大错了。当会后有同志问我，我也觉得今后什么是对的，自己也搞不清了，解释不清。

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极度悲痛，市委不让悼念，戴黑纱还说浪费，说什么用了多少黑布。贺汝仪在一月十四日诬蔑群众悲痛哀悼是：有的利用群众情绪搞铺张浪费，不劳动，不工作。

文汇报攻击周总理的事件群众提出疑问，韩英杰在四月七日传达说：马天水讲，关于文汇报3月5日的问题是反革命信号弹。徐景贤讲：是夜班编辑删的，还嫁祸外地说全国有五家报删了，长江

日报和文汇报一段、解放日报一段一样。贺汝仪还威吓说，我们这条战线有信谣传谣的。

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上海不传达，在群众质问下，文教组匆匆传达还不让记录，在后来绳树山还到电影局解释说，江青批创业的十大罪行传达不早，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传达的也不迟。韩英杰还说《创业》的批示是邓小平逼着毛主席批的，这些我都照着望下传，未压群众。

四人帮和上海市委自封为真正的马克思主席最革命最正确的代表。他们用这欺骗了我们，又通过我们在电影银幕上欺骗广大工农兵群众。

四人帮为了控制上海电影，文化部、上海市某些人勾结起来，给我们施压力。在74年11月5日刘庆棠、金祖敏这二个四人帮的黑干将跑到厂里进谗：“上影厂历史长，有经验的的多，有经验的干部也多，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在电影革命中有点闯劲，要有新的成果。”还为四人帮和市委鼓吹说：上海各行各业走在全国的前头，……电影战线在上海市委领导下，也应为全国树立榜样……“想信会赶上”，并说上海意识形态领导很强，确实领导很好，上海市委很关心，市委领导好，上影厂很幸福，市委领导不仅关心，而且懂行”，刘庆棠那时就歪曲事实，攻击一些领导，制造分裂，在他吹捧了一通上海市委后，还说“别的省也很关心，……可有的说，

‘影片的好坏我不知道’，上海市委很关心，很懂行……希望上影厂和上海其他战线一致起来，拿出好片子来。”

金祖敏叫嚷：“电影战线相对来讲比其他战线差一点，……电影确实跟不上……刘庆棠提了希望，提了意见，厂里好好研究一下……。”在这又批又捧的鼓动之后，我第二天就赶忙传达，按刘的要求提出赶超《闪闪的红星》，二委还找了差距，全厂动员赶几部片子，当我们拼命在国庆拿出几部片子以后，由于跟的紧，卖力，在1975年2月25日文化部电影局（筹）四人帮的黑爪牙吕韧敏才来上海加封说：“部里研究时，觉得上海潜力大，寄希望上海……”又说：“上海是电影的半壁江山，形势好有决定意义。”

75年6月3日绳树山在电影局说：“文化部认为上海市委抓电影很具体，很细致……部里认为上海电影的形势很好。”

在今年《金锁》这部使用上海彩底的片子一出来，又为四人帮王洪文宣扬自己抓国产片捞取了资本，徐景贤在审查完成片时又说：“上影厂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电影的半壁江山”、这“上影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是对我们的耻辱，可当时我听见是高兴的。

在75年8月，四人帮封锁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文化部在北影受到抵制时，要去北京开会，绳对韩英杰讲：北影因《创业》

问题对文化部意见比较多，我们支持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工作，发展电影创作。徐景贤也说：“文化部老于他们现在工作困难，我们上海要支持文化部。”逼得我们《阿夏河》、《小凉河》分别在“五·一”和“七·一”赶出来，逼得车间工人、摄制组同志几天几夜不出棚不睡。

在《战船台》出来后，广大观众反映并不好，可是徐景贤讲：“《春苗》表现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指《战船台》）是中期，好就好在写了被批了的干部上台又搞老一套。”还说：“抗战八年出那么多写抗战的，文化革命十年为什么不多出写文化革命的，怎么会雷同，暗示要写文化革命中老干部都是咒骂“别再来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一套”的人。

当我们75年前出片少的时候，徐景贤为给四人帮制造上海是他们领导最先进的假象，说：“上海不多拿出几部片子是不行，是和上海不相称的。”

当我们出了几部片子，特别是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登了全国有六部优秀中上海占了三部的的时候，徐景贤有一次在审查片子时别有用心的鼓动说：“上海的片子质量不高不行，你们今年（指76年）国庆至少在数量上要超过去年，质量不能超过《春苗》、《第二个春天》，也不能低于去年的。

今年徐景贤、王秀珍在一次会上叫嚷，担心上海影片质量下降，

没有重大题材，没有《春苗》那种片子的份量的时候，张家龙亲自炮制了为王、张歌功颂德的《盛大的节日》，于会泳来上海要这部片子在政治、艺术质量都要好。张家龙还跑来会有介事的传达：领导要求质量不高宁可不出，他们为着篡党夺权反革命的需要，忽而要“量中求质”，逼得我们吃睡不得安宁，忽而“求质量不求速度”，今天表扬我们是作了努力的，明天批评我们党委不得力，对这些做法我虽然在心里埋怨，他们是反正都有理，正确都是他们，但我不敢反抗，不敢违拗，有牢骚也只能在家里关着门或私下跟个别人说说。

四人帮凌驾党中央之上，在党内自成体系，他们对抗毛主席关于秘书权力不要太大的指示，通过他们的秘书，直接指挥上海市委，直接指挥市委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张家龙又直接控制我们上影。张家龙凌驾于局、厂党委之上，全厂革命群众早有反感，厂党委早有反感，我自己也有意见，但是因为他是徐的秘书，成为上影的总厂长、总导演，象群众说的，是上影厂的大上皇。这样上影就直接被四人帮所控制。

他们批邓另搞一套，在《欢腾的小凉河》影片中插进去了，他们借批邓为名，攻击当时主持工作的周总理，攻击地方的领导（摄制组会有专题揭发），他们利用我们上影为王洪文、张春桥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指使张家龙改编《盛大的节日》，市委写作组要

“朝霞”发表《盛大》剧本。陈冀德提出要努力加强剧本中井峰的形象，要让他代表党，代表无产阶级支持造反派，并伪造反派内部的工作”，朱永加甚至说，可以考虑让井峰做剧中的主角，陈冀德对“朝霞”编辑部讲：“不知大家是否记得……工总司本来要分裂，是张春桥做了许多工作，才避免了分裂……”，张家龙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更是费尽心机的大加井峰的戏，并且说要把《盛大的节日》搞成一部“按既定方针办”的教材贡献给中国人民，贡献给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另有专题的揭发）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文化部和上海市委的某些人，一方面交本子，交题材，下任务，一方面又大叫“社会主义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别有用心地要写党委书记、写部里、省里、中央的走资派。王洪文5月8日在钓鱼台接见上海开会的人说：“写地富反坏，接触党委书记少，其实，坏事都在党内负责干部，不然，下一代怎知道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变化形式就不懂了。”现在清楚了，他这是把四人帮自封最革命，他指的“党内负责干部”就是指反对他们阴谋反党集团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他是让我们宣扬他们，歪曲事实，攻击中央和地方的大批领导同志。他们的流毒渗透到这几年我们的每部片子，每个剧本。

四人帮控制我们电影厂为他造舆论，的确起到了效果，外地想投寄四人帮的坏蛋，看我们在上海市委控制下敢于表现别人不敢

表现的所谓“禁区”、“尖端”题材，就通过我们和四人帮挂勾，江西就有一个小丑，自称是田春苗的战友，写信给厂里转到市委，转到四人帮手里的（文学组有专题揭发），这里我要揭发的是：

王洪文在今年五月八日那次接见上海到京开会的人时，除了他借吃夜点机会说“有人说钓鱼台没有鱼，我就钓到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抗毛主席之外，还宣扬他是抓电影支持《春苗》的，并极为重视用左手写信的田春苗的战友，我见他赞赏这个人，还奉迎的说：“他还写了一个剧本《后代》”，当时王洪文这个阴谋家、野心家还责备“为什么不写个报告给我们”，我当时心里还觉得“中央领导”这么重视，还认为又有了一个可为的好本子。回来立即向文学组传达布置，四人帮阴谋败露，现在我们清楚了，他们控制我们造舆论，我们为他们阴谋服务了。通过我们厂把江西的一个小爬虫给四人帮挂上了关系，我这是在犯罪。

同志们，这三年多来，四人帮控制了我们的党，我还以为是执行了正确路线，我紧跟了他们，做了错事，执行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感到了极大耻辱，我本想经过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的批判帮助，在工作中将功补过，可是又错了，不但自己错，而且带动全厂同志蒙受耻辱，上当受骗，我愿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帮助，一定和同志们一起与四人帮决战到底，狠揭深批，在斗争中提高觉悟。

上海市电影局办公室整理

1976年11月3日